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多次遭遇不幸,因为用人单位没有购买社保,如今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个打工家庭的命运虽然并不常见,但也绝非孤本。南方日报近日接到了近百起广州周边外来工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投诉报料。当外来工和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外来务工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可能成为导致矛盾激化的根源。

举家打工还债 父母双双病倒

自从 2008 年南下广州后,蔡昌雄一家三口再没回过湖北武汉的家,几年前贷款盖的砖瓦房,如今早已是青草萋萋。

2006 年,18 岁的蔡昌雄与人发生冲突被砍伤,经鉴定为七级伤残。父母从亲戚朋友处借了十几万给蔡昌雄看病。2008 年春天,一家三口来到广州打工挣钱还债。

蔡家在荔湾区城中村租下一个单间后,便开始了漫长的打工还债生活。母亲姜秋英先后在当地三家宾馆当过服务员,而父亲蔡国春带着儿子在过去几年中做过洗车、服务员等多个职业。

2011 年 4 月,父子两人经过考试,同时进入了黑龙江宇林公司广州分公司工作。据了解,这家公司承包了广州地铁的部分维修工作。经过半年试用期考核,去年 11 月份,蔡氏父子与该公司签定了劳动合同,成为广州地铁维修工。但是父子俩发现,公司在这份劳动合同中,并没有提到为职工购买社保。

蔡国春回忆称,“当时签合同,大家都知道没有买保险。有些工人要求买,但是负责人说‘要么自己走人,要么被公司开除’。”面对每个月 3500 元的“诱人高薪”,蔡氏父子再三考虑后,决定留下。

蔡家人打算着,“省吃俭用,不到五年就可以把债还清,还可以省出点钱把家里房子翻修一下。”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 9 月开始,母亲姜秋英不停咳嗽,偶尔发烧。两个月后,姜秋英的病越来越

严重,到广州市中医院检查后姜被确诊为“巨块型肝癌”晚期。

一想到家中尚未还清的债务,姜秋英坚持拒绝住院治疗,“都已经是晚期了,就不要再花钱了。”无奈之下,父子俩将姜秋英接回家中休养。

儿子蔡昌雄到处帮母亲询问治疗肝癌的偏方。姜秋英每天的医药费大约 200 多元,目前已花去 3 万元。为了让妈妈休息得舒服一点,蔡昌雄终于低价租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虽然没钱治病,但也希望能让妈妈安心过完剩下的日子。”

今年的 2 月 15 日,一家三口搬进“新家”。但命运似乎并没有让蔡家感到欣慰,半个月后,蔡国春

全家病患不断,没有社保深陷困境—— 一个打工家庭的非典型样本

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3 月 1 日,广州地铁公园前站。吃完工作午餐,蔡国春匆匆赶往工作地点。在通过地铁通道时,他突然晕倒,不省人事。工友将他送到车控室中,给他服下救心丸。之后蔡昌雄赶到,将父亲送到珠江医院进行检查。

3 月 3 日,检查结果出来:蔡国春“心脏重度狭窄,建议尽快住院手术,更换人工主动脉瓣”。医生蔡家,“如果再晕倒一次,蔡国春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蔡国春拒绝住院手术。“做一次手术就要七八万,还有医药费,家里哪有钱啊。”

缺乏基本保障 生存难以为继

昨天上午,记者在蔡家租住的房子中见到了这对双双卧病的夫

妇。在潮湿阴暗的一楼房间里,姜秋英紧紧拉着记者的手痛哭,情绪激动的她猛咳起来,“每天我们就这样躺在床上互相问着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家就成了这样。”一旁的蔡昌雄摸着母亲消瘦的面庞,泪流不止,“又发烧了。”

房间里的电灯早已坏掉,蔡昌雄拿着台灯仔细查看母亲。安慰好母亲后,蔡昌雄又带记者来到蔡国春躺着的小阁楼。

蔡国春试图坐起来,刚挣扎了一会就已气喘吁吁。“我和儿子都被公司停职了,我们也没有买任何保险,跑了很多地方都没个说法,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儿子忧虑的面容,蔡国春更是紧锁眉头。“家

里除了一台电视机,一个电饭煲和一辆自行车,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连变卖都没有卖的,房子迟早也会租不下去。”

蔡国春病发后次日,蔡氏父子找到公司相关负责人,希望能够以公司名义购买社保,但相关负责人以公司为外省单位,不能购买广州医保为由拒绝。同时,蔡昌雄的员工牌被收回,该负责人认为,蔡昌雄目前的精神状况不适合地铁维修工作。一位史姓负责人表示“什么时候上班,要看他的精神状况。”

辗转多个部门 遭遇困难重重

3 月 11 日,宇林公司负责人来到蔡家,送来父子俩二月份的工资共 6000 多元。同时要求蔡昌雄签协议“证明公司曾到蔡家看望过”。蔡昌雄以没有解决事情为由拒绝。

相关链接

记并缴费,从缴费的次月起,参保人如患病需要就医,即可享受门诊统筹、门诊慢性病、门诊特定项目以及住院等统筹支付待遇。

■专家观点:企业应负全责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永平表示:出现这种企业不给职工购买保险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管理的缺失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应该负全部责任。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可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来解决,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扮演从宏观上引导和监督的角色。目前我们国家保障弱

势群体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公益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缺。他们能更好地表达弱势群体的声音,更有效地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公益组织:“工友太缺乏法律常识”

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学系的曾飞洋 1998 年创办了专门为工人服务的“打工族服务部”。曾飞洋认为,像蔡家所遇到的情况并非个案。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想方设法规避社保责任:如跟工人签订“自愿书”,要求劳工“自愿”放

“你们要求买保险,那就准备好相关资料,过两天我们就过来拿。”该负责人留下这句话后离去。

在此期间,蔡昌雄奔走在各个政府部门。

最初,蔡昌雄来到荔湾区劳动局投诉,由于黑龙江宇林公司广州分公司是在天河区注册,蔡昌雄随后又找到天河区劳动局。天河区劳动局则要求蔡昌雄到工商局查出该公司的注册信息,蔡昌雄找到信息后,又被天河区劳动局介绍到了天河区法律援助处。

3 月 13 日,史经理通知蔡昌雄,公司已经为其父子购买了三月份的保险,准备再为他们购买三个月。但史经理坚决否认公司有“要买保险的话,要么走人,要么被公司开除”的说法,并表示该公司员工流动性比较大,工人们一进公司就有口头约定,工资里包含保险费。“要不然你以为你一个打工的能拿到几千块的工资?”

令蔡昌雄感到奇怪的是,他在天河区地税局并没有查询到相关的参保记录,工作人员称,蔡氏父子的信息只是通过广州俊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地税局进行登记,但是黑龙江宇林公司广州分公司还没有交钱,所以他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办理好参保。

昨日,蔡昌雄就此事询问史经理,史经理承认确实还没买,称公司是“挂靠俊博人资的,具体操作由俊博来做”。史经理同时也表示“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上法院公司也奉陪”。

据该公司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友透露,他们都没有购买保险。对于史经理说的工资里面包含保险费,工友表示都不清楚。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工作人员了解了蔡家的情况后,建议蔡昌雄先到天河区工商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时到天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将蔡氏父子停职事宜。听了他们的建议后,蔡昌雄心里多少有了点谱,“在这里,我有种回家的感觉。”

南方日报(闫昆仑 喻春燕 沈梦怡)

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委多次表示:小产权房不合法,要试点清理。然而,记者最新调查发现,目前小产权房在一些城市不仅规模越来越大,品种也越来越多,价格让人叹为观止。

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村,京城有名的小产权房集中地。记者 16 日刚一进入郑各庄村的地界,就看见东西长 2 公里、南北宽 1 公里的范围内,一栋栋六七层高的楼房蔚为壮观。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个叫“宏福苑”的小区共有 80 余栋住宅楼,是郑各庄村利用村集体土地,从 1998 年开始陆陆续续盖的房子,本村人早就住上了,还有不少房子卖或租给外地人了,前些年销售价格是每平方米 6000 元,现在每平方米 1 万多元。

郑各庄村西边,正在兴建所谓的“养老国际公寓”,目前已基本建成 5 栋。在一片高墙后面,一幢幢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在这个名为“水城御墅”的大院内,“藏”着数十栋四合院。这些四合院最小的面积也约有 800 平方米以上,晚清格局,有廊有院,气派非凡。

售楼处处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宏福苑、“养老国际公寓”“水城御墅”都是村集体自己建设的房子,不是商品房。“养老国际公寓”是小户型,目前销售价格每平方米 15000 元左右。“水城御墅”四合院是村里最新打造的高端产品,单套四合院起价 2000 万元,最高为 5000 万元。

没有土地证,不能上市流通买卖,一直被视作小产权房的最大风险。如何绕过这道“坎”?售楼人员告诉记者,“养老国际公寓”开创 70 年会员制地产模式,会员资格可继承、转让、兼具投资价值,一代投资,四代受益……宣传资料只字未提产权,但 70 年会员制承诺看起来很“诱人”。

售楼员直言不讳,“您可以比较下,周边的商品房品质不一定比这强,价格都要高一些,买不买您自己掂量。反正现在很多城里人来买。”

“小产权房会不会被清理?”对此,售楼员告诉记者,像宏福苑、“养老国际公寓”“水城御墅”四合院等将来都会进行确权登记,而且规模这么大,人都住进来了,谁会把这些房子拆了?”

新华社·新华视点

小产权房怪胎 考量管理智慧

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小产权房不合法”,打击非法用地。另一方面,一些小产权房建设有愈演愈烈之势。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小产权房这个怪胎,使国家减少了大量土地出让金收益,同时还威胁到耕地保护红线,暴露出城乡土地二元管理的巨大漏洞。”

面对小产权房的蔓延趋势,不少地方明令叫停。如何处理已建小产权房并让群众接受,又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十分“挠头”。小产权房牵涉众多群众利益,情况复杂。有些符合城乡规划但未确权,有些不符合土地利用、建设规划,但住满了人,拆迁时容易影响社会稳定。无论如何,面对新一轮小产权房建设的顶风违法,是任其“生长”还是迎难而上,这既需要有关部门敢于“破题”,更考量其智慧。

新华社

3 月 14 日,县直某部门一把手赵先进(化名)从北京招商引资回来了,当晚同事和朋友要给他接风,被他一口回绝。他需要休整一下了,在北京的日子里,他的神经基本上没有清醒过。

赵先进说,这次北京之行“战果”颇丰,有几个项目达成意向,同时,还结识了一些北京的“领导”。

“我是一个手里拿着药,一个手里抓着酒瓶子。”赵先进说,“还有人更厉害,有心脏病的,怀里揣着救心丸,喝酒的时候一点也不少喝。”

喝酒已经成为“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曾经在某县挂职调研两年的北大博士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写道。

然而,“酒精”考验的公职人员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不少人

都从内心抵触。

“可以说,我们是公款吃喝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这事儿管好了,绝大多数人都高兴!”两会上福建代表团鲍绍坤的一席话,算是说到赵先进心坎里去了。

既然酒喝多了伤身,很多人从内心里又不愿喝酒,为什么还要

“如果你不参加任何一个酒局,那么你势必会被排斥在圈子之外。”

冯军旗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写道:“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

冯军旗发现,从喝酒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干部的关系网,

领导“一口干”心里就“暖暖”——一名基层官员眼里的官场“酒经”

喝?赵先进用简单的两个字回答:“国情。”

这次去北京招商引资,对赵先进来说是硬任务,必须完成,招待不好谁来投资?所以,“喝死也得往上冲啊!”

更多的时候,酒则充当了官场上关系运作的一种润滑剂。对此,在基层挂过职的冯军旗深有体会,

种奇怪心理:敬酒时,如果领导一口干了,他心里会升腾起一丝暖暖的感动;而如果领导只是随意沾了沾,他心里会有一种小小的失落。

赵先进喝酒也有可以“随意”的时候,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他坐主宾位的情况下。当别人敬他酒的时候,他竟发现自己多少也有点在

意对方酒杯里代表的“诚意”。

赵先进甚至觉得自己仕途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的酒量不够大。

在乡镇干了 20 年,好不容易熬成镇党委书记。他现在成为县直某部门一把手,仕途上基本已经没有上升的空间了。

“你说茅台酒到底有多好喝啊?说实话我真喝不出好来。那为什么喝它呀?因为它贵啊!”赵先进认为,中国官场上,喝的不仅仅是酒,喝的是权力和地位。

广州日报